《说“大朝”：蒙元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相较于前文，更多体现的是作者的综合分析、判断的能力，以及对宏观历史的整体把握。那么接下来的几篇文章则主要是基本的史学工夫——考证的展示。本文通过对钱币、公文、碑传、史籍等材料的爬梳、整理，探究了蒙古帝国的“国号”问题。得出结论为：在忽必烈采取“大元”国号前，蒙古已经有蒙古文国号和“大蒙古国”与“大朔”两种汉文国号。从“大朔”到“元朝”国号的递嬗，反映蒙古从游牧国家向中原王朝转变的完成。

《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在本文中，作者考证了衍圣公恢复爵位的经过，指出这一过程有耶律楚材在背后大力相助，且是中央及地方汉人官员及释、道二教相互合作的结果。

《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兼论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与儒道势力的消长》分析的是蒙古帝国时期国子学的发展，并兼而讨论大蒙古国时期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和儒道二家影响力的消长。“涵化”（acculturation）指的是因多种不同文化相互接触，从而导致的文化变动以及心理变化的过程，也可称为文化适应、文化移入（维基百科）。本文的结论为：蒙汉菁英的有限涵化自窝阔台时代已经开始；国子学初创后，归道士掌握，且儒家经典在国子教育的地位，与匠艺相当，不及语文，反映蒙古人重实用。而国子学的儒学化要等到忽必烈的潜邸时代方开始。

《忽必烈“潜邸旧侣”考》探讨了忽必烈的潜邸幕府集结的原因和经过，他们本身之间的渊源和派别以及他们的表现和贡献，以及追寻忽必烈扬弃蒙古传统而创建元朝的来龙去脉（“扬弃”或许极端了一些）。原因上，忽必烈集结幕府，是时代演（蒙古人认识到无法完全依靠自己来治理汉地），和个人身世（忽必烈年轻时常和汉地人物接触，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心得）的的综合结果。经过与幕府人员的派别暂不谈，就结果来说，作者认为“潜邸旧侣”启迪了忽必烈的汉化思想，尽力协助他重建汉地作为个人政治资本，进一步压制蒙古本位主义，在元朝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通过几个案例，向读者介绍了元初的遗民（激进型、温和型、边缘型），以及改仕元朝的“贰臣”。原先遗民与贰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类型，但随着时间变化，“遗民型”人物多转化为“贰臣”，罕有人能长期坚守原则。

《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本文虽主要讨论的是蒙古与色目人的遗民问题，以十六个人为例，但笔者对本文引言部分所介绍的明初汉族遗民更感兴趣。据作者所引的钱穆、劳延煊和郑克晟的观点来看，元明之际的汉族文士夷夏之辨观念极为淡薄，更认同元朝作为正朔，而对朱明不满，呈现强烈的遗民情结。此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缘故为何？此问相当重要，可能与对元明易代的整体评价有紧密的关联，不可不特加以注意。